

变迁

——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史

一部记载党家村商业发展历程的力作

黄德海◎著

人民出版社

变迁

——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史

一部记载党家村商业发展历程的力作

黄德海◎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迁——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史/黄德海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9

ISBN 7-01-005860-1

I. 变… II. 黄… III. 乡村—商业史—韩城市 IV.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4294 号

书 名: 变迁——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史

著作责任者: 黄德海

责任编辑: 康 宁 刘一冰

书 号: ISBN 7-01-005860-1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网 址: [http://www. peoplepress. 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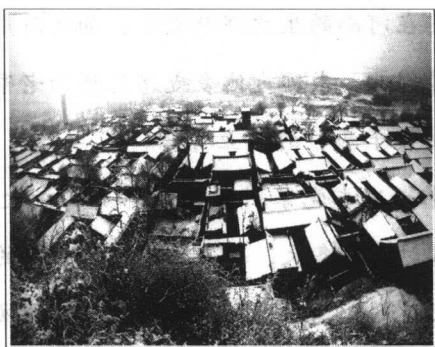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前言

党家村地处陕西省韩城市，2001年6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韩城市东隔黄河与山西省河津市相望，黄河两岸民众在历史上就曾有过频繁往来和多次的群体性迁徙。司马迁祠坐落于市区南郊，是韩城地区古代文明的象征。从商业历史变迁的视角看，党家村地处由晋商商业圈、陕商商业圈和司马迁“货殖”学说交叉覆盖下的一个三维商业文化地带。

在元末至整个明代，党家村人完成了党、贾联姻与合族而居两件大事，为其商业在清初的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族群基础。1654年，党族人党德佩远赴河南经商，不久即获成功。又几十年之后，贾族人贾翼堂也前往河南经商。后者不仅成立了一家更大的商号，同时还模仿晋商采取了“股份制”的经营方式。生意上的巨大成功使党家村人开始在原籍村落大兴土木，为后人留下了123座古色古香的四合

院。至清末，因其在河南的生意渐趋衰败，加之时局不靖，党、贾两族的商号纷纷歇号停业，或远走他乡或回迁陕西老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曾经“日进白银千两”的商业神话。

1981年，我第一次去党家村时就对那里的一大片四合院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那时正是冬天，路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白雪。党家村人沿街道两旁，或叼着烟卷三五成群地聊天，或把头枕在胳膊上一言不发地蹲在那里晒太阳，似乎描绘了一幅“穷者自穷，富者自富”的自然经济画卷。

到了1989年我再去看的时候，情况已有所不同。那时村里正在大搞旅游经济，不时有零星散客从我身边走过，临时招募的导游小姐用夹杂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认真地向游人叙述着党家村四合院的变迁故事。另外还有一大群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和日本九州大学的专家们正在做调查，他们拿着相机和本子围着一百多座四合院进进出出，不停地记录着。据说有一位名叫本田昭四^①的日本教授在现场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留在了党家村。此次访问激发了我描写党家村的最初冲动。

十多年之后，应朋友之邀，我又重访党家村。这一次，我更坚定了研究党家村的决心，因为多次的访问及阅读仅有的文献使我终于有了和党康琪先生一样的感觉：党家村的确不同凡响。

党康琪生在党家村、长在党家村，不仅是党家村“文革”后毕业的首届大学生，而且也是研究党家村历史的专家。他说，他从小就

^① 1989年5月，日本九州大学博士、代表团副团长本田昭四教授在考察党家村时高兴地夸奖说：“啊！奇迹！东方人类传统民居的活化石！”回到宾馆后，本田昭四先生仍激动不已，于是在宴会上多饮了几杯，不料心脏病复发，虽经全力抢救，但仍给党家村人留下了“一笑身亡”的悲壮故事（吉春，雷英：《党家村趣话》，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

觉得一切就该这样——住这样的房子，走这样的巷道，爬这样的寨子坡，怎么也不会产生特殊的感觉。但等他长大后，走出了村子，走出了韩城，走出了陕西，跑的地方多了，才觉得故乡不同凡响。这并不是思乡的情结所致，而是对环境建筑理智地比较后使然。

虽然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但各自的切入点不同。我不是党家村人，自小没有住四合院的感觉，也没有对党家村历史的追忆。但我有我的优势：我可以作为局外人冷静、客观地去描写，而不为满腔依恋故土的情结所淹没。更深层次的印象是，党家村在明、清两代的历史演变中始终充满了商业气息，这种气息占据了四合院内的一砖一瓦，占据了党家村人的每一根神经。它沿武关道一路南下，又弥漫了整个瓦店镇和賂旗镇。

学术界的许多著作在论及小农经济时，总免不了使用“传统”、“保守”、“无知”、“商品观念淡漠”等词语来描述农民的经济行为，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非理性经济，因为他们不懂得扩张并积累财富，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不懂得“储蓄和投资”。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可以被纳入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畴。它提供的案例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消除人们的这一认识误区：

首先，在明代近三百年的变迁过程中，党家村村民根据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为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曾先后进入山区经营山庄子。这意味着，只要能发现具有更高投资效益的生产区域，农民的储蓄和投资意愿就会明显提高。

其次，农民的创新性行为一直在以某种速度增加。不承认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农民为什么能够做出从事商业活动的选择，甚至也难以理解为什么“十大商帮”能在明清之际崛起。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经济行为，并非是农民的“理性”发

生了变化，而是由于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造成的可供其选择的方案不同所致。

显而易见，研究党家村至少具有这样两方面意义：一是做了一件党家村人一直盼望有人来做的事情；二是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能清楚地描述那段时期中国农业和商业发展及变迁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经过数日的走访和考察，我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并将党家村商业的发展变迁作为写作的突破口。尽管这是一次小范围内的考察，但我试图从其不同凡响之中找出解释中国元、明、清三代历史演变的某些规律，因为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段静止的过去，而是一段孕育着未来的历史。

我所思考的问题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商业未兴起之前（也就是元、明两个朝代），党家村党、贾两族形成了合族而居的村落演变形态。当时，党家村面对着一个什么样的国内政治与经济环境，并且这一环境当中所包含的皇族权力对这样一个中国北方小村庄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又有怎样的影响？更进一步说，为什么党族始祖党恕轩的播迁行为会发生在元末明初？党家村的地理环境和制度环境对党、贾两族的繁衍又有怎样的规制和约束？

(2) 明朝的统治延续了近三百年。在此期间，各地商业曾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为什么党家村却仍停留在农耕社会？另外，这一时期为什么在党家村历史上又显得如此的漫长？

(3) 早在康乾盛世之前（顺治十一年），党氏家族为什么能产生第一位经商者——党德佩？他为什么要远下河南经商并把瓦店镇作为其首选之地？换句话说，究竟又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在这时敢于去“闯荡江湖”？

(4) 又半个多世纪之后(乾隆十五年),贾氏家族的贾翼堂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也离家南下,他瞄准的经商地域不是瓦店镇,而是赊旗镇。不久,党家村商业即进入了其鼎盛阶段,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贾翼堂选择的时机是在乾隆盛世?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他有能力使党家村商业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迅速腾飞?

(5) 至20世纪初,党家村在瓦店镇和赊旗镇的生意都已经接近尾声。此时,其商业的主要继承者们纷纷逃回党家村,有的闭门不出忧郁而终;有的甚至跪倒于祖先坟前自杀身亡。这就自然引出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为什么党家村商业的结局这么悲惨?似乎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只大手将党家村在清初高高地举起,然后又在清末重重地摔下。

本书记述了党家村在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变迁过程,从经济学的角度,并结合文化、地理等因素对此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揭露出其商业兴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本书不仅填补了党家村研究的一项空白,同时也为丰富陕商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和视角。

黄德海

目 录

CONTENTS

—— 前 言

1

—— 第一章 党家村：公元 1331~1654 年

- 第一节 皇权更迭与经济政策 //3
- 第二节 党、贾联姻与合族而居 //10
- 第三节 山庄子：家族早期扩张的组织形式 //27
- 第四节 山陕商业圈交叉下的党家村商业 //41

—— 第二章 铜瓦店：公元 1654~1911 年

- 第一节 康乾盛世与商业发展 //55
- 第二节 铜瓦店 //64
- 第三节 “恒兴桂”号 //76
- 第四节 四合院内的村落变迁 //86

—— 第三章 金賒旗：公元 1755~1911 年

- 第一节 金賒旗 //101
- 第二节 “日进白银千两” //111
- 第三节 山陕会馆 //128
- 第四节 一个商业神话的破灭 //138

—— 附 录

- 附录一：党家村大事年表（公元 1331~1948 年） //155
- 附录二：党家村古民居重点保护区名单 //159
- 附录三：司马迁祠及司马迁的商业理论 //166
- 附录四：賒旗镇山陕会馆古碑文选载 //172
- 附录五：清代及民国时期賒旗镇商业各行业经营状况一览表 //175

—— 后 记

183

第一章 党家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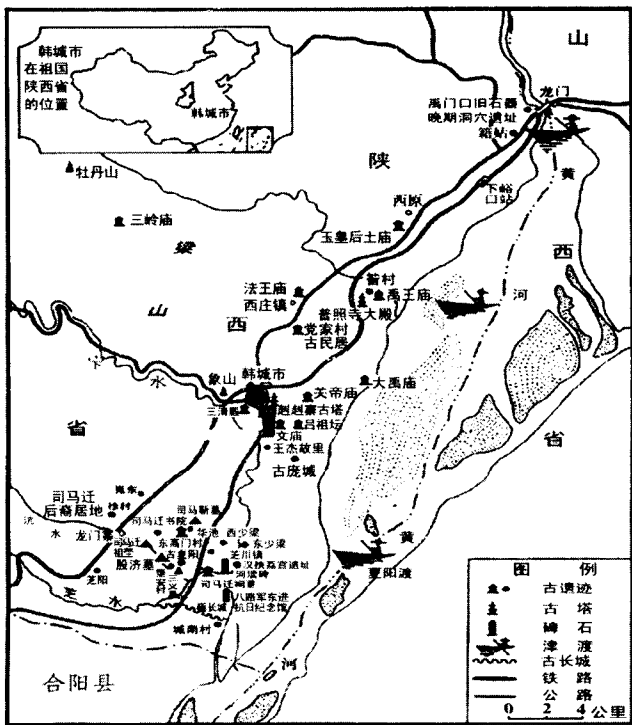
公元 1331~1654 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史记·货殖列传》

第一节 皇权更迭与经济政策

如果从元太祖由龙门渡黄河西进^①时计算，韩城被蒙古人统治的历史大约持续了140年。在此期间，韩城成了蒙古人南下的给养基地^②，因此其经济也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直至元末红巾军起义为止（参见图1-1）。



（资料来源：参照《韩城市志》有关插图绘制）

图1-1 党家村的地理位置

经过元代一百多年的发展，韩城已初步呈现出“南敦稼穡，北尚服贾”的经济

① 《韩城县乡土志》（清光绪年间张瑞玘编）第六十三课《薛仪》中曾描写了金军从韩城渡黄河的历史事实：金，薛仪，倜傥不凡，少有大志。既冠，值金末世，元太祖由龙门渡河，仪率居民迎之，以招降河东北山诸堡寨功，赐符节，为千夫长。又以从东帅李守贤平定河南功，为栎州守。栎州，仪之乡也，里闲锦衣，乡里荣之。

② 杨茵：《党家村史话》，打印稿，2002。

格局。实际上，早在西汉时，韩城就已开始用煤炼铁，至明代时已有一定规模^①。大批铁制工具可以由黄河各渡口装船运往中原和南方各地，因为韩城这一带，尤其是黄河龙门，不仅是军事要隘，而且也是连接秦、晋两省并进而来往西北与华北的交通纽带、商业贸易的航运渡口^②。农业、手工业再加上军事方面的需要足以能够说明韩城之所以成为元军南下基地的原因。

自成宗铁穆耳于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病故之后，元朝就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宫廷权力斗争之中，直至灭亡。宫廷斗争的实质是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它给整个权力机关带来的伤害在于：争斗本身削弱了宫廷内部以皇帝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从而打破了权力在宫廷内外的对称，并由此影响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在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下，政府无暇顾及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因此也就更谈不上将元世祖的经济思想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

从权力来源的角度看，元代的上层建筑没有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更多的是帝王个人独霸一切的气质和排山倒海般的武功。元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被忽必烈一手垄断，他的后人也只能是随着他的规划而行事，很少有所调整。马鞍上驰骋自如的骑士借着自然的力量征服了大多数在小块土地上种田的农夫，却缺乏组织上的技能，不能使两方同时受益而前进^③。

宫廷权力斗争不可能被控制在红墙之内。它总是要以争夺民间资

① 明《韩城县志》（明万历张士佩修）卷七中记载了用煤炭烧石修路的趣事。另据《同州府志》明天启五年本记载，韩城“县城西五里有大象山与龙门山接，产石炭。龙门山煤炭极多，供秦晋两省之需”。

② 李长喜，赵艺华：《龙门古渡的商业》，见《韩城文史资料汇编》，第12辑，73～74页，1993。

③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174～17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



源的方式溢出，而对民间资源的争夺则意味着掌权者势必要采取使他人受损、自己受益的方式进行。到了元代中、后期，争夺的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与以往朝代不同的是，元朝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在一个大一统国家范围内全面实行纸币制度的王朝。纸币的发行以及币值稳定不仅使之成为了当时已存在的农产品交换、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的媒介，同时也改变并加快了技术进步的演变路径与速度。元代以中统宝钞为主，并始终通用，作为一个普遍的支付与计算手段，它具有与金、银一样的价值。

但是自成宗朝以后，纸币没有继续发挥其作为商业媒介的功能，反而被元王朝当成了获取更大权力的工具——币值稳定不再是一个合理选择。货币当局错误地认为，纸币发行是一项买卖，它成本低、收益高，发行越多则国家越富裕。于是，国家的经济安全成了纸币发行的一个机会成本。负和博弈的结果造成了元代中、后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各地物价飞涨，投机盛行，正常商业受到了摧残，当然也包括作为元军给养基地的韩城地区商业的发展在内。

中统正元年间，元政府发行的钞票还不算过多，但是继位的皇帝却不能再保持这种记录，并最终演变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情形也解释了元朝不能成为一个有主体性的朝代的原因，同时也形成了朱元璋必须以铁腕建立其统治的时代背景^①。

从中统钞发行的数字上看，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的发行额只有11万锭，至元十一年就增加到24.7万锭，至元十二年又增加到近40万锭，至元十三年因征服南宋，发行额猛增为140万锭。到至元十七年，发行量虽降低至113.6万锭，但这时中统钞的发行总额却

^①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9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

已高达5 391 325 锭，人均占有量4 584 文，分别是发行初的74 倍和6.8 倍。早在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 年）的时候，物价便开始波动，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 年）以后就进入了通货膨胀阶段^①。

其次，土地兼并也是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从历史的视角看，土地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从来都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元代的土地制度包含有三方面的内容：皇室私田、官田和民间屯田。其中，官田又可分为分地、赐田和职田三大类^②。元朝的皇帝不仅拥有大量私有土地，同时也是整个国家土地的名义所有者，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尽管元世祖忽必烈曾反对土地兼并并下令禁止，但是皇室受封贵族、达官显要以及僧侣寺院等，却一直未停止过通过侵夺、受施舍以及买卖官田等方式扩大自己的土地规模。土地兼并一方面满足了权力拥有者的欲望，同时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土地商品化以及整个社会的商业化进程。像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样，土地兼并的结果有两个：一是地主贵族阶层的出现；二是大量流民的产生。两者一起共同导致了元朝的覆亡，因为就前者而言，土地兼并使皇室贵族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从而使其通过“宫闱之变”成为未来制衡皇帝权力的主要人选；而后者在成为流民之后，一部分逃往边远山区寻求新的发展，更多的人则汇聚成伙扛起了起义的大旗，正如元末社会上流传着的一首散曲所言：“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元朝的历史仅一百余年，但其经济政策（如发行货币等）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加快了商品流通，同时也推动国家经济在其他方面

^① 余耀华：《中国价格史》，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

^② 陈喜忠：《中国全史·中国元代经济史》，8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取得了进步。首先是大面积推广棉花和高粱的种植，尤其是棉花的引种不仅推动了手工纺织业的出现，同时也永久性地改善了中国人对服装的需求结构；其次是建筑业，元代沿袭了两宋的建筑风格，并进一步融入了宗教教义，为其政治理念和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的宣泄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渠道。仅在韩城这样一个偏僻的地区，元代建筑的遗风至今仍可见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在黄河禹门口河中巨石鲤鱼岛上修建的陕西大禹庙^①及之后在韩城城南芝川坡一带修建的汉代大文学家司马迁墓。其中，后者的外形酷似蒙古包，是元世祖在位期间下令建造的^②；再次是漕运和海运业。元世祖时开凿了会通河和通惠河，把原有的运河连接起来，使漕运粮船从杭州可直达大都。后来，元军统帅伯颜感到海运方便，于是就取道海洋运输；最后是元代社会文化的繁荣，史称“宋元文化”。其发达的文化形式，诸如戏曲、绘画和教育事业等，不仅继承了蒙古族能歌善舞的民族传统，丰富了汉族的精神生活，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些文化形式的传播，元政府才能为其上层建筑的正常生存打下一个信仰制约的政治基础。但是，元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人民拒绝服从其统治。公元1351年，元政府因治理黄河而引发了红巾军起义。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刘福通等人趁势领导河工在颍州起义，起义军头裹红巾，史称“红巾军”。

到了明代，朱元璋在经济方面的业绩主要集中在屯田、开中制、兴修水利、道路和赋税改革等方面：

屯田可大致分为军屯和民屯，主要以民屯为主，其中民屯又可分

① 毁于抗日战争时期。

② 更详细的资料请参阅杨茵，吉春：《元·修建八卦墓》，见《韩城文史资料汇编》，第12辑，13～14页。

为移民垦荒和商人屯田两种。从性质上讲，屯田是明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增加粮食产量，增强国力的一种强制性做法。大规模的移民垦荒运动造成了农村人口大迁徙和土地的大开发^①。

元末明初的战乱导致了全国许多地方“城邑空虚，人骨山积”^②。从图1-2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北伐路线途经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和华北地区，向西的一支部队曾攻击至潼关，接近韩城县。再加上北伐之前，朱元璋为剿灭陈



图1-2 元红巾军起义及征战线路

友谅和张士诚等地方武装曾转战于江南和四川一带，致使大片国土“地广人稀”^③。洪武二十八年，户部郎中刘九皋曾上疏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④

民屯是指移民垦荒。明初，朱元璋下令制定多项优惠政策，鼓励

① 林金树，高寿山，梁勇：《中国全史·中国明代经济史》，1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五六。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